

经典

歌德《进军法兰西》：

你们可以说，你们曾是在场人

□李昌河

Johann Wolfgang Goethe
Campagne in
Frankreich 1792《进军法兰西》
德文版封面

在距今200年的1822年，依据当年日记、书信和其他资料，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出版了《进军法兰西》(Campagne in Frankreich, 1792)一书，为他的自叙性作品文库(已出版《诗与真》《意大利游记》)增添了一部新著。这部作品表面上是歌德在挽留记忆，背后深意却是见证了19世纪前20年间欧洲大大小小此起彼伏的战争，作家在提醒人们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年是歌德逝世190周年，在这里谈谈歌德这部鲜为人知的作品，以此文纪念这位伟大的德国诗人。

在1792年8月上旬，奥地利和普鲁士集结起一支联军，取道特里尔和卢森堡入侵法国，声言要对已被扣押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及其王室“拔刀相助”。歌德的君主卡尔·奥古斯特·冯·魏玛公爵率领人马参加，歌德因此也成为联军的一员。《进军法兰西》的叙事线条便是歌德的这次随军。

《进军法兰西》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的日记体形式，叙事自由天然，表现作者个性，行文走笔生动与朴素兼具，也有言简意赅得让无相关知识的读者颇感费解之处。整体来说风格不凡，既反映事件，也表达内心，记人、写景、抒情、思考、议论一应俱全。后来的很多表现战争题材的德国文学作品，譬如恩斯特·荣格表现一战的著名小说《格林纳姆中》，都受惠于肇始于歌德的这种写法。

第一篇“日记”，内容就有密度，画面在快切。从到达美因茨拜访熟人开始，到与流亡者家眷的偶然接触，到信使的话中有话，到法国女人恳求歌德帮她打听丈夫下落，到邮筒前的嘈杂拥挤……歌德组合彼此无涉的零散，以1792年8月下旬在奔向奥普联军路上遇到的人、事、情景和氛围的记叙，将读者带进那段“历史”，有别于完全虚构的文学方式。驳杂叙事透露出追求

“应有尽有”写作意向，个人记忆的语言含着独特、意象、思想方面的东西，值得反复品味：“数百封信投了进去。好似秋水破堤，人们的身、心和思念都争先恐后要去挤进邮筒口涌向各自国家。那般互不相让的急切，如果没有见到，是想象不出来的。”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进军法兰西》里歌德后来也时常提到邮件马车行踪，既是随军经历的一个点面，也是对那场战争进程的一个暗喻。历史上，奥普联军开头显得一切顺利，没费多大事就受降或攻占了法国一些城镇，到了9月中旬却陷进瓦尔密战役泥潭，便知武装干涉已为不可也不敢强，为避免全军覆没赶紧撤退，10月初就退出了法国边境。瓦尔密战役后的邮件马车行踪，在深谙以小见大艺术辩证法的歌德这里，其一以小见大之处就在于可让人看到联军是在原路撤回。

歌德是在1792年8月27日那天赶上已进入法国境内的奥普联军的。身为一个文人的他自然不会担任军事职务，只负责一些进军路上的边角事宜。读者可以看到他很多时候是在他的君主、使团、军官之间往来。当然歌德也有离开这个圈子的时候。《进军法兰西》给人以历史性和真实性的感觉，也因为叙事者通过“我”与他人的交叉，用流动视角时而叙述他人，时而讲述自己，两者相互补充，扩大着活动与感受范围，对进军法兰西的那些人也有取镜和深探。

歌德记载了8月28日他在隆维庆祝了自己生日，记载了联军的帐篷，记载了联军的开拔，记载了所见和听闻的法国方面情形，记载了联军长驱直入很快兵临巴黎城下，记载了往水里投石而喜滋滋地观看水底的五颜六色，记载了大雨、泥泞、疾病、疫情造成的阻碍。“一路上非常艰难，到达了朗朗库尔。看到地下室、厨房都空荡荡的，当地人已人去楼空。能头上有个屋顶，坐在干燥板凳上吃点携带不多的干粮，对我们来说已是夫欲何求。屋子里家具简陋，只满足最基本生活需求，静静散发着过日子气息，还让我感念‘居’的味道。”尽管天气恶劣，歌德的心情是开朗的。在奥普联军进军法兰西之初，歌德对那个历史事件的判断与当时不少人一样，是有误的。

歌德没有自己的战地经历，只是作为历史事件在场人记载了奥普联军对凡尔登等法国城镇的炮击等。文字大都客观，也含少许态度。一战期间，发生过对峙法国军队的德军士兵在战壕里朗读歌德记载、鼓舞自己士气之事。因此二战后的1946年，占领德国的占领军当局只将《进军法兰西》的后部分《围攻美因茨》编辑进一套《世界文学经典》丛书，作为让德国人接受思想再教育的读物，对《进军法兰西》则打入“另册”。实际上，《进军法兰西》也有人道主义的彰善瘅恶。当年仓促进军，奥普联军后勤补给出现大问题，便对当地居

民强行征收食物和用品，一些联军部队因此格外恶名远扬。歌德没有掩饰他也在参与和组织征收，同时也记载了征收与抢劫无异的邪恶：牧羊人的羊被征收了，无奈无助，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像孩子般呵护的羊被急不可耐要吃烤肉的士兵就在他们的脚边破肚开膛了；我不得不承认，不曾有过比这还更为残忍无情的残忍场面呈现在我的眼前，不曾有过比这还更为痛楚至极的男人痛楚进入过我的心境。只有在看古希腊悲剧的时候才让人感到过如此之里外苍凉，淡随沧桑”。

歌德的笔端为世人记录了欧洲、德国史上没有记载的牧羊人的遭遇。当然，如果歌德有足够勇气，他其实还可以为世人留存下那段“军旅”期间的更多见闻。不过在魏玛的生活已使歌德变得沉稳，甚至谨小慎微，如同恩格斯的评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文字会避开锋芒，不去招惹起不悦。对于是否书写更多的亲历和见闻，还在那个时候歌德就做了一个决定：“要说的可以很多，已说了的也已很多，但这段特别历史的很大部分永远都必须是秘密”(1792年10月歌德致同僚的信)。因为要顾及活着的人和尊重死去的人，所以尽管已经时空拉开、时代更迭，对当年的亲历亲历也不能以“实录”方法全面展示出来。《进军法兰西》里的一个他人之口，实则可谓歌德的“夫子自道”：“允许他写的，他不愿意写，他愿意写的，他也不会写！”

奥普联军当年有8万之众，在那个时候是支颇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却难料兵败法国，铩羽而归。人们分析的原因除了糟糕天气和后勤补给问题外，还有联军统帅布伦瑞克公爵与普鲁士国王之间的分歧和不睦。“国王陛下骑在马背翻岭越谷，就像颗彗星核，后面跟着长长的彗尾般的亲兵队伍。这队人马刚刚消失在我们眼前，另一方的一队人马就出现在了山岗上，到达了山谷里。那是布伦瑞克公爵，身后跟着同样类型随从。我们只是观看，不去琢磨，但心里免不了要问这两位大人中谁才是那个位置最高、意见不一时拍板定夺的那个人？此问无答，留下不知道、不清楚的我们。”歌德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为后世的人们留下了那次军事行动的一些“秘密”。

《进军法兰西》叙事既有欲言又止的暗示，也用明晰方式讲述了因果如同是只无形和无情的手。去的路路上已抢光了一切，回来路上就几乎再也找不到食物，被饥饿和疾病折磨致死的士兵以及精疲力竭倒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的牲畜到处都是，联军队伍的这些凄风苦雨、狼狈不堪，歌德都有所见并记载于笔。歌德还讲了他的仆人和马车与他走散，读者可以想象当年奥普联军撤退的溃不成军。离凡尔登不远，歌德碰到魏玛公爵的送人马车，搭乘其离开了联军，离开了那些不知命运如何的士兵。进入凡尔登后，歌德又与走散了的马

车和仆人不期而遇。一直都在匆忙撤退，几乎没有好好歇息过，1792年10月14日歌德到达卢森堡，得到了一周休整。随后，歌德打道回府，由于法国军队反攻进了德国境内，最终他于12月16日才回到魏玛家中。《进军法兰西》后面部分是歌德离开联军后的“日记”。歌德在这里开启了另一个记忆空间之旅，记叙了他回家途中拜访的人、路过的城市、与他人的交谈和遭遇的路途不畅等。最后两篇“日记”篇幅特长，歌德一任笔墨流淌，放言历史、时代、个人、内心等等之事，横无时间边际，只笼统写了“11月”，没有精确到日。

这是一部对于那个时候的读者而言题材新鲜和关涉重大的自叙性作品，但它的可读性不强是个事实。它是以对人、事、经历的感受贯穿全篇的，歌德对人生、创作、社会的立场、思考、价值取向表达其中。穿越时间隧道，歌德对光线和色彩世界的着迷，歌德对贵族世胄和社会名人的不故作敬重和亲和，歌德用康德《判断力批判》观念为自己的大自然研究兴趣“辩护”，歌德收到母亲书信后对曾想今后从政的青年时代时代的回忆，歌德秉持的文学要书写沉重的审美意识，“天然的必须是和必须要保持无倾向性的诗人，对两个相斗部分(即美好的和不美好的)的状态都要探究，调和不可能的，他必须作出的决定是以作品结局为悲。喧嚣的世界，难道不总是循环往复的悲剧在威胁我们”，都让读者对歌德有更多了解，即便歌德写进“日记”的并不都是熠熠生辉和夺目耀眼的思想或事迹。

令人感触的是歌德自己的改变。奥普联军进军法兰西之初，歌德对布伦瑞克公爵和奥普联军持“无条件信赖”，认为战争必将势如破竹很快获胜。但战况出乎意料，使歌德认识到战争会让世界改变，可并不一定就是原本意图的改变。联军在瓦尔密地区遭法军重创，一边咬牙切齿，一边垂头丧气，有人要求歌德说上几句。“以前我通常是讲点不长的段子，激发大家哄笑而开朗起来。这次我说的是：世界史的一个新时期在这里和在今天开始了，你们可以说，你们曾是在场人。”歌德这句话片言居要，应该是说出了正在他心中反复的回声。当然，歌德当年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今天已无法考证。就《进军法兰西》而言，歌德这句话微妙和多义，根据上下文语境可以理解为融合着经进军艰难而来、经人道痛苦而来、经人性悲悯而来和经兵燹教训而来的经验和理性，是站在一个知而后智的精神高度提醒人们：是时候了应该去反思战争自身。如是理解，歌德这句话不由得让人联想杜牧《阿房宫赋》的警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是理解，歌德说这话时心里想的应该不只是眼前的那些人，而是全世界的整个人类，因为歌德说的是“世界史”。

《克兰福德》小镇的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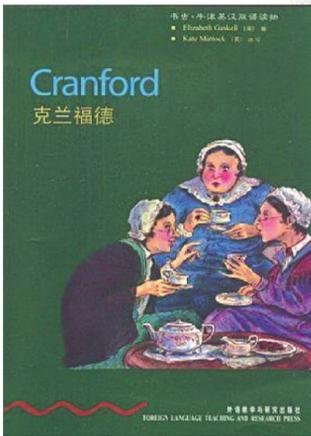
□杨靖

成不变——既是习惯使然，更是经济因素制约，因为小镇无力发展工商业，大多数人只能像马蒂小姐一样依靠继承的遗产生活，这也逼迫她们处处精打细算——同时又不失体面。詹金斯小姐新购了一块地毯，每天一早便小心翼翼地铺上旧报纸(为确保闲聊八卦的“新鲜度”，她联合其他三四位夫人小姐集资订阅一份《纪事报》)，以免阳光暴晒。她的服饰常年不变，据说只在极其隆重的场合才会添置一顶新帽。相比之下，马蒂小姐更为节俭，她奉行“蜡烛经济”——为了节省蜡烛，她在寒冬午后编织毛衣时总是将身体靠近炉火旁取暖。事实上，通常情况下，只有在光线极为暗淡、而她又不得不阅读“那些字迹不清的信件”时，她才会点燃蜡烛。与此同时，她要求房客玛丽学会“盲打”(毛线)——“像盲人一样习惯于在黑暗中劳作”，令后者叫苦不迭。

根据盖斯凯尔夫人在致罗斯金书信中的说法，克兰福德小镇祖上也曾经“阔过”，之所以到19世纪中期前后风光不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存在多种原因。首先，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工商业迅猛发展的时代，此时海外殖民风潮也步入全盛期，二者皆需要大量人力。乡村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社会失去活力(“失血”)，自然也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其次，工业化和城市化吸引广大男性青年离开乡村，进入伦敦、曼彻斯特等大都市谋求发展，造成乡村“空心化”，而留在乡村的老弱病残消费能力低下，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尤为严峻的是，上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导致更深层次的“社会机能失调”，造成所谓单身女性过剩(即“剩女”)现象，这一方面加剧了老龄化趋势，一方面更降低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正如小说中人物所言，奉行雅致经济是“不得已而为之”，即便有意铺张，实力也不允许。

早在《克兰福德》问世4年之前(即1849年)，盖斯凯尔夫人已留意到这一现象。她曾在美国《萨廷联盟杂志》(Sartain's Union Magazine)撰文，回顾她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并预言小镇未来的生活——“没有未来”——文章题为《最后一代英格兰人》(The Last Generation in England)。照她的看法，假如有志之士对此严峻形势无动于衷，英国乡村必将走向没落和衰亡。据说当时的“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阅读本文后深受触动，曾计划以此为主题撰写一部《英国乡村生活史》。

在以马蒂小姐为代表的妇女团体看来，保养马车、购置礼服、举办大型宴会等“炫耀性消费”(范布伦语)殊无必要，因为“节俭即体面”。与这一雅致经济相反的是粗俗经济(能挣会花，或挣钱即花)，似乎只有在挥霍浪费中才能找到一丝快感(而此后又难免感到空虚)。毫无疑问，诚如评论家所言，此处的雅致经济是小说家对主流政治经济学说“宏大叙事的戏仿式批判”：斯密在《国富论》中宣言，“我们不能借着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的善行而获得晚餐，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重。我们从来不向他人乞求怜悯，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派经济学家也认为，“社会好比一架机器”，即便出现短暂无的故障，只要加上一些“杠杆”或“调节器”，就能轻而易举



易行——宛如“割韭菜”，然而却是以劳工阶级和底层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像她的友人罗斯金一样，盖斯凯尔夫人坚信当下政治经济学(卡莱尔称之为“沉闷的科学”)最大的症结在于忽略了社会生活中“不可估量”的因素——即情感因素。而她在本书后半部分大力倡导的正是这样一种出于同情之心且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以团结合作取代恶性竞争的新型经济模式。

马蒂小姐在一家杂货店听闻银行即将倒闭的消息：一位农民模样的顾客掏出该银行发行的5英镑钞票付账，却被当场拒付，于是她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金磅换回那张5英镑钞票，因为她认为“穷人的汗水和小幸福更为重要”。回家以后，她坐立不安，“手里一闲，她就会想起那个拿着那张没用钞票的可怜人，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当友人指责该镇银行领导层必须担责时，她却辩解那些董事也和她这类受害者一样“值得同情”——那些董事管理不善，有负别人所托，“良心上一定很痛苦”。

马蒂小姐决定变卖家产帮助银行偿还欠债。她的这一义举也感动了周围亲友，尤其是妇女团体所有成员。她们自发募捐(每人捐出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帮她租赁房屋，并通过竞拍购得她原先的家具，供她无偿使用。玛丽的父亲是曼彻斯特一名成功的商人，玛丽劝说他担任马蒂小姐的理财顾问(当然是免费)。在热烈气氛烘托下，现任教区长也果断出手，买下马蒂小姐之父私人图书馆所有藏书——并极为客气地修书一封：“如蒙惠让将不胜庆幸。书价不论，当如数奉上。”

马蒂小姐的生计问题也成为众人关注的话题。经过反复权衡，大家最后决定将马蒂小姐的居所改造为一间茶叶店。这自然是个不错的主意，但马蒂小姐却顾虑重重——因为镇上杂货店也兼营茶叶。“她觉得应该先和约翰逊老板打个招呼，于是便購



盖斯凯尔夫人

着我到他铺子里去了一趟，把自己的打算告诉约翰逊老板，询问他这样是否有益于他的买卖。”玛丽的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将马蒂小姐的这一举动斥为“胡闹”——“要是做生意的都这么你来我往地商议照顾对方的利润，那还讲什么竞争，买卖又怎么做得下去？”但结果却出人意料。这一套在大都市曼彻斯特行不通的“生意经”，在克兰福德效果却好得出奇。“约翰逊老板不仅和蔼地打消了她的顾虑，说她经营茶叶对他全无妨碍，而且还不断把自己那里的顾客打发到马蒂小姐这边来”——同时宣称“他店里的茶叶都是一般货色，而马蒂小姐那里有各类精品”。

《克兰福德》发表后，很长一段时间在评论界颇受冷遇，有人将它贬称为“怀旧的乌托邦”，暗讽这种“舍己为人”的经济学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存在。在一些评论家看来，似乎一夜之间，对茶叶生意“一窍不通”的马蒂小姐茶叶店成功开业，听起来更像天方夜谭。但这一则“二次创业”的故事确实代表了盖斯凯尔夫人的社会理想，即克兰福德居民自发对操控市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发起抵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唯利是图，相互倾轧，以低质获取利润的最大化。而克兰福德妇女团体却坚持认为，在此之上，经济活动还有更高的目标，即道义、良知及责任感。她们清醒地意识到，面对冷酷无情的市场法则和外部竞争，如果她们不能结伴抱团，物质上相互帮助，精神上相互扶持，则势必独自面对凄凉落寞的晚年。因此，为朋友尽力，在她们看来，“不仅是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快乐”。

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曾指出，“从幼时起，维多利亚人就被灌输了这样一种理念：财富和体面是一体之两面。”在本书中，盖斯凯尔夫人却通过对克兰福德雅致经济的描摹(与伦敦的过度消费形成鲜明对比)，论证“体面的节俭”生活与体面之可能性。在书中，她构建了一个即使失去财富也不会失去体面和尊严的偏远小镇：一个由妇女友谊组成的经济体系，它富于弹性和张力，并且能够承受外部世界的经济压力。综观全书，尽管盖斯凯尔夫人对克兰福德小镇的守旧落伍提出了温和的批评，但与此同时，她更展示出一个未被外部经济力量玷污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盖斯凯尔夫人笔下的克兰福德为维多利亚时代面临的经济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行性方案，这一解决方案“更加重视人的因素而非金钱，更加重视友谊而非数字”。

小说结尾的一个细节颇耐人寻味：马蒂小姐竭力劝阻顾客购买本店绿茶，因为她相信“绿茶相当于慢性毒药”，但顾客执意购买，让她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很显然，马蒂小姐的暖心之举是对以自利为驱动力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嘲讽。马蒂小姐将顾客的利益置于她个人的利益之上，表面看似违背了所谓商业法则，但事实上其目的在于以“合作制”的社会道义取代竞争制的商业道德，从而彻底颠覆古典政治经济学奉行的价值观。正如文学批评家尼莫所言，盖斯凯尔夫人在小说中倡导的新型经济学，并非“资本主义的角逐和自私”，而是类似于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制，因为她深信“合作是高等物种生存的方式”——唯明乎此，方能读懂资本主义。